军中帝国的码事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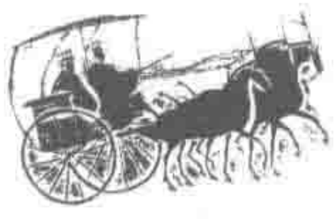
郭建龙 著

梳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战争演变
把脉中央帝国统一与衰亡的内在逻辑
规律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郭建龙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9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 郭建龙著 .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9.9 (2019.9重印)

ISBN 978-7-5459-1612-6

Ⅰ. ①中… Ⅱ. ①郭… Ⅲ. ①战争史—中国—古代 Ⅳ. ① E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95774 号

ZHONGYANG DIGUO DE JUNSHI MIMA

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

郭建龙 著

出版发行：鹭江出版社

地　　址：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361004

印　　刷：三河市兴博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杨庄镇
大窝头村西　　**邮政编码**：065200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插　　页：4

印　　张：28.5

字　　数：435 千字

版　　次：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59-1612-6

定　　价：7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两千年帝国，两千年战乱

统一战争与衰亡战争

所有战争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一方的所得，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所失。由于战争的损耗，即便所得的一方，也要遭受巨大损失。在整体上，战争对整个人类造成的是破坏和伤痛。人类不得不通过战争重新分配利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的博弈。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战争有且只有一个好处：将国家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这里，国家统一只是手段，市场统一才是人类的福祉。

在世界上，中国之所以一直作为大国存在，就在于它的地理天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疆域，在这个疆域内的人们倾向于成为一个整体。在统一的国家中，人力、物资、资金这三种最重要的要素都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在国界之内，人们也不用过多担忧人身和资本的安全。

正是统一市场的出现，使得统一战争一结束，当社会恢复了和平，就会形成一次新的盛世。不管生活在古代盛世还是现代盛世，人们都是幸福的，他们安居乐业，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协作，共同创造了财富的黄金时代。

但是，历史上不是所有的战争都是统一战争，还有许多战争导致了国家的

分裂。根据这两点，我们把战争分成了统一战争和衰亡战争。

也因为这种划分，中国的战争就有了第一个密码：在乱世时期，战争促进了统一，统一又结束了战争；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大国崛起的幻象会让很多和平时期的人再次渴望战争；这种战争就带有巨大的破坏性，即便是打胜了，也会造成社会不可磨灭的伤痕。

这就是为什么在朝代初期，人们总是讴歌那些将国家统一的战争，因为通过战争，他们获得了长久的和平，能够在稳定的大市场中过上好日子。

当日子刚刚开始变好时，人们更加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害怕和平被新的战争打断，这时对战争的看法就变得负面起来，更倾向于从个人的遭遇角度去解剖战争的残酷。

可社会发展到更富足的程度时，没有经过战乱的民众在民族情绪的刺激下会渴望武力，战争的阴影再次复活，整个社会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很可能要进入衰落期了。

朝代中后期的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主要是经济上的。为了战争，政府必然要加税，而加税又必然导致社会的凋敝。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旦经济进入了下行周期，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反而会增加，因为当社会上没有了赚钱的机会，许多人就会考公务员进入官僚队伍，所以，社会下行时，养官成本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这种增加最终会拖垮社会经济，到了这一步，就可能进入下一个改朝换代的周期。

如果我们把朝代之初的战争视为统一战争，那么朝代中后期发生的战争则可以称为衰亡战争，它导致了社会的分裂和衰落。

但衰亡战争又是很难避免的。在封建帝国中，必然存在着强大的宣传机器，用于鼓动人们的情绪。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民众情绪的积累必然失控，到这时，不是皇帝领导社会去打仗，而是社会自发地推动皇帝向战争方向前进。

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对于人类的智慧不抱太高的期望，在未来，战争必定还会出现，也许现在已经在路上。

既然战争无法避免，就进入了本书探讨的最主要问题：那些历次战争的胜利者是怎么胜利的？那些失败者为什么会失败？其中有什么秘密可言？

战争的地理逻辑

与人们强调人心所向不同，乱世时期的战争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反而是地理。

中国人对于战争的认知大都来自那句古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实际上，真正能够进入战略的只有地利。所谓天时，更多是战术层面把握的稍纵即逝的机会，而人和也并非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标准。只有地理是长久不变的，如果论山脉，从人类出现后就基本上没有变化；如果说水体，在几十年里也是相对固定的。

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军事战略家，首先是一个精通地理的人。当刘邦进入咸阳时，萧何首先想到的是进入秦宫室将天下图籍搜走，就是为了了解地理关隘的所在，为后来的楚汉战争指明了战略方向。诸葛亮的《隆中对》之所以著名，在于他率先将南方的地理纳入战略考量，制订了从南方如何反制北方，甚至统一北方的战略。在他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从关中和中原出发，才能获得天下，诸葛亮的策略虽然最后没有成功，却极大地丰富了南方战略，使得他之后的军事家都必须在他的基础上重新制订全国战略。

本书所考察的，就是以地理为基础的军事战略，并试图总结其中规律性的因素。

本系列的前两本《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都能区分出明确的历史大循环，比如秦汉以来的中国财政大周期只有三次，而哲学大周期只有两次。但在军事上，战争的逻辑却并不能区分出如此明确的周期。

实际上，军事规律是随着人们地理视界的打开而变化的。秦汉时期的战略家在统一战争中很少考虑南方，因为当时的地理中心在北方，南方太微不足道了。可是，到了三国时期，南方的长江就成了战略重点之一。在秦汉时期，关中是全国最重要的地理要素，可是唐代之后，关中地区虽然还很重要，却再也不是战略地理中心了。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中原和长江都还不够富裕，到了唐代，东部的财富远超西部，对于东部的地理也已经探索完毕。

不同时代的发展，决定了军事战略的演化。

中国的军事战略演化可以分为五个时代，分别是：关中时代、分裂时代（长江时代）、失衡时代（第二次关中时代）、中原时代，以及以蒙古和满洲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帝国时代。

第一个时代关中时代，包括了春秋战国到秦汉的数百年时间。这个时代最典型的地理基础是，当时的中国文明国家大都以关中和中原两个地方为中心，唯一的例外是占据了江淮地带的楚国，以及刚刚进入文明视野的四川。

当历史局限在这个区域之内时，人们会发现关中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这主要是由于，除了关中之外的其他地区没有形成可以防御的封闭式结构，比如中原虽然足够富裕，却没有足够的天险抵挡四面的攻击。只有关中是一个四塞之地，在它的四面都环山，且有函谷关、武关、大散关、萧关四大关口保护着其中的土地，只要把守这些关口，从任何一面进攻关中都是极其困难的。

即便在秦汉时期，仅仅靠关中仍然不足以与全部中原和江淮对抗。关中的优势在于，还有两个富裕的盆地成了它的附属，那就是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一旦关中的政权同时掌握了汉中和四川，就拥有了足以与整个中原对抗的资源，同时由于关中、汉中、四川都地处上游，打击中原更加占有形胜。

秦国正是借着这个战略统一了中国。当秦朝崩溃后，汉高祖又按照几乎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中、汉中和四川反攻中原成功。

但关中模式也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江淮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关中、汉中和四川三地中的任何单独一个，所拥有的资源都无法与中原抗衡，只有三者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联手才可以对付中原。东汉光武帝就利用这个弱点，乘关中、汉中、四川等地四分五裂时，以中原为基地反击关中得手。这次反击，也预示着关中优势已经成为过去。

关中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人们探索关中地理战略所留下的经验，还会在以后的战争中屡屡被使用。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时代的落幕，并不意味着前人探索经验的失效，它只会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在新的战略框架之中。

第二个时代分裂时代，是长江成为中国战略主角的时代。关中时代是围绕着黄河制订终极目标的，长江地区由于发展较晚，处于附属性地位。但随着长

江地区经济发展，这里逐渐拥有了与北方抗衡的资本。特别是光武帝顺着长江三峡进攻四川，将四川与湖北打通。在这之前，通往四川的主道是从关中出发的蜀道，这使得四川一直是关中的附属地，但自从四川通过长江与湖北直联之后，四川逐渐加入了南方阵营，与关中的关系反而疏远了。

在分裂时代的开篇，是两个划时代的军事战略，分别是东吴张纮提出的江东战略，与蜀汉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两个战略的共同点，是提出长江不再是北方的附属，而是足以与北方对抗的基地。张纮指出了江东地区的重要性，认为首先占领了江东，再顺长江而上，将赣江谷地（江西）、湘江谷地（湖南）收入囊中，最后进攻荆州，甚至四川，这些地区加起来已经足以和中原对抗。诸葛亮则认为，只要占据了荆州和四川，就拥有了两条北上的道路。在中国南北之间沟通的主要通道本来只有三条，占据了两条，就足以借助四川粮仓，向中原发动钳形攻势，甚至统一中国。

张纮和诸葛亮的战略虽然都没有完成统一中国，却是对长江流域最好的战略探索，为日后的中国战争增加了足够的深度。

东晋南北朝更是进一步对长江进行探索，特别是中下游区域，探索出了“建康（南京）—荆州”轴心，这两个超级城市成了南方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一个轴心、两个重点区域（南京和荆州）、三个湖（洞庭湖、鄱阳湖、巢湖）、四条江（长江、汉江、湘江、赣江）、五座城市（镇江、马鞍山、九江、岳阳、武汉），构成了南方的军事战略基础。

但在探索结束时，人们发现，南方虽然足以称霸，却很难统一全国。这和南方较少战略纵深有关。北方由于有太行山和山西高地，构成了足够的纵深，使得南方对北方的攻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然在某一个点被迫停滞。而北方对南方的进攻，却只要攻克了长江就行，再往南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纵深空间和富庶的粮仓，构不成对北方的有效抵抗。

南方的这种缺陷，导致它可以丰富中国的军事战略，却很难颠覆北方的优势。于是，北朝借助地理优势最终统一了南方，结束了分裂时代。

隋唐时期开始的第三个时代（失衡时代），战略重心又回到了北方的关中地区，但这时的关中已不足以支撑整个庞大帝国的战略中心，使得唐代的战略一

直处于失衡状态。

由于关中不够富裕，为了保卫和养活关中，唐王朝花费了大量的财富，却仍然无法解决失衡问题。加之无法解决养兵难题，唐朝皇帝发明了节度使这种制度，却将帝国送上了不归路。

但是，安史之乱中，叛军由于战略错误并没有占上风。这时山西的作用凸显了出来，唐朝就是从山西太原起家统一的全国，安史之乱中，又是由于唐军守住了山西，并防住了襄阳、商丘一线，使得安禄山的军队被压缩在华北平原一个倒“L”形的平原区域。这个区域由于缺乏制高点，使得安禄山如同风箱中的老鼠，四处挨打。如果唐王朝完全采取李泌的关门打狗策略（见本书第十二章），安史之乱将更快被平定且后遗症较少。但可惜的是，唐朝没有采取这种策略，虽然平定了叛乱，却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失衡时代，另一个战略浮出水面，成了后世的叛乱者们经常使用且屡屡奏效的战略。这就是黄巢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当一个帝国处于不稳定状态时，起事者最好的方式不是建立基地，而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长征，击打帝国最虚弱的地方，直到引起它的财政和行政崩塌，灭亡帝国。黄巢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能长征的人，给后来的李自成等都提供了范本。

失衡时代表明长安再也无力主导中国的战略发展，于是，中国军事战略史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中原时代。这个时代以北宋为代表，甚至可以延续到明清时期。

中原时代的关键是在中原地区找到一个足够富裕又拥有战略优势的中心点。不幸的是，宋太祖赵匡胤虽然看上了洛阳，却由于过早去世，让开封成了北宋首都。这个失误造成了中国的指挥中心处于无法防守的大平原上，加上北方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得游牧民族可以长驱直下，直捣龙庭。

北宋的策略失误到了明代被弥补，明成祖将首都选在了最具有防守优势的北京。但到了明朝后期，北京的劣势又被放大：由于地理的关系，北京可以防御北方的攻击，却无力抵御来自南方的叛乱。

在中原时代继续的同时，另一个时代也到来了，那就是元朝和清朝所代表的帝国时代。这个时代，中原、长江等汉人居住区已经更加合为一体，皇帝要

做的更多的是将边缘地带——整合进入中央帝国。

如果没有元朝和清朝，中国的国土面积将缩小一半以上。元朝是划定中国新疆界的开始，可以说，元帝国当年征服过的地方，大部分现在都还保留在中国之内，元帝国没有征服的地方就永久性地成了外国。越南和云南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在宋朝时都不属于中国本土，但由于蒙古人征服了大理，使得云南彻底并入了中国版图。而越南由于击败了蒙古人，永久性地成了外国。

清朝虽然是靠击败李自成取代明朝而占据了中原，但它获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是靠和当时另一个霸主准噶尔人竞争而赢得的。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如果准噶尔人获胜，中国将是一个小得多的国家，但清朝的胜利，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多元化的庞大遗产。

本书叙述了中国历史上军事战略的详细演化过程，探讨每一个时代的军事关键点，寻找那些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秘密。理解了这些，才能理解中央王朝如何成长，直到成为现在中国的模样。

本书与传统的军事史书有两大区别：

第一，本书既不探讨三十六计，也不强调民心可用，而是从技术化的角度出发，聚焦于最不易变的地理因素，旁及其他，来叙述中国两千年的军事战略演化史。这样做，是想让读者在读历史时，不光是看热闹，而是知道每一场战争背后的逻辑所在。只有了解了客观的历史，才会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第二，阅读本书，实际上是理解中国地理的一个过程，从关中出发，直到新疆、西藏，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会更加理解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幕悲喜剧，并在谈论中国现状时，也更能理解它的演化和逻辑所在。

楔　子

蒙古人：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协同作战

为了进攻南宋首都临安，蒙古人选择现在甘肃境内的达拉沟作为进攻起点，以云南大理为中间点，实现了上万里的大迂回，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最有想象力的进攻之一。

宋元时期，沟通中国南北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分别是长安（汉中）四川道、南襄隘道，以及淮河平原交通网。北方进攻南方，通常选择三条道路的一条或者几条。

蒙古人在传统的三条道路上都遭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从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他们必须重新掌握机动性，才有可能击败南宋。

蒙古人重新获取机动性的方法，是首先进攻云南，再以云南为基地，从南方包抄打击南宋的重庆与湖北地区，形成大迂回。

为了进攻云南，蒙古人在中国西部开辟了几条前无古人的进军通道，完成了这个上万里的大迂回。

获得云南后，蒙古人在数千里的战线上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协同作战，这本来是一次载入历史的大战略，却由于一个人的死亡而功败垂成。

在天时、地利、人和诸因素中，地理是讨论战争问题的基础。本书的目的，就是抛弃那些主观的成分，讨论中国的地理在历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每次战争的具体逻辑，引导读者了解战争背后的客观事实。

甘肃与四川交界的一个小山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奇袭的起点。

这座山沟叫达拉沟，位于一条叫作白龙江的河流上游地区。如果现代人想从内地去往这个偏僻的山沟，必须首先从西安出发，跨越巨大的陇山山脉，去往三百五十公里外的甘肃天水，再从天水向南，前往二百三十公里外的陇南市。从天水到陇南同样要翻越好几个山谷，才进入位于迭山山脉以南的一条河谷盆地，陇南市就坐落在这个小盆地上。这里看上去相当偏僻，除了市区之外，四处都是高山大壑，在中国古代，已经属于极端的边疆地区。但是，陇南仍然不是故事的起点。

陇南所在的河谷叫白龙江谷地，是由一条同名的河流冲刷而成的。从陇南开始，白龙江继续向东南方奔流几百公里，汇入著名的嘉陵江。而要想到达本书提到的现场，不是沿河向下，而是向着河流上游方向再西行二百多公里。

一路上，这二百多公里都是沿着白龙江所在的峡谷前行，谷地极端狭窄，即便最宽处也只有几百米。在峡谷的南北两岸，是两列高耸入云的山脉。这两条山脉近在咫尺，却截然不同，南侧是著名的岷山山脉，而北侧的叫迭山山脉。

在河谷靠近迭山山脉的一侧，有一座小城叫作舟曲，这里在公元2010年曾经发生了巨大的泥石流，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在舟曲附近，河谷越发狭窄，由于山脉太高，是滑坡、落石、泥石流的高发地带，行走在峡谷中，仿佛已经离开了文明。

从舟曲继续向前，到达一个叫作迭部的县城。在这里，白龙江已经缩成了一条季节性的小水沟，抬头可以望见岷山山脉巨大的雪峰。已经是河流的极上游，再往西走，地势会突然变平坦，就进入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了。从陇南到迭部虽然只有两百多公里，却路途艰难，即便开车，也往往需要一整天时间。

但迭部县还不是故事的起点，这里距离达拉沟还有数十公里。从迭部县城出发，向东走三十公里，从白龙江的北岸过到南岸，就会看到一条湍急的小河（也是白龙江的主要支流）在岷山山脉上劈开了一个山谷。顺着小河走到山谷的尽头，形成了一片山间小盆地，这个小盆地才是达拉沟的所在。

从西安到达拉沟，即便借助最便捷的交通，也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到达。

达拉沟如此偏僻，但在七百多年前的元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这个谷地里却拥挤着一支远征的大军，在如今荒芜的高寒树下和草甸中，曾经人声鼎沸、马嘶刀鸣。对这支大军来说，达拉沟还不叫现在的名字，而是被称为“忒剌”[①]。

在来到这个偏僻地方之前，远征军已经跋涉了千山万水。主要人马是从现在的蒙古境内赶来，经过内蒙古、陕西北部、宁夏，到达现在的甘肃境内，又从甘肃兰州附近的临洮穿越了迭山山脉，才到达了达拉沟，[②]集结时间就花费了整整一年。

这支大军的统领叫作忽必烈，在当时，他的身份是蒙古大汗蒙哥的弟弟。副统帅则是刚刚从俄罗斯境内回来的大将兀良合台，他也是蒙古人最骁勇善战的勇士速不台的儿子。

那么，蒙古人如此大动干戈，他们攻击的最终目标是哪里呢？答案出乎意料：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个西部的小山沟里，最终的目标竟然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南宋首都临安（杭州）。

即便到了现在的高铁和柏油路时代，从杭州到达拉沟的距离也在两千两百公里以上，几乎是绕着当时的中华文明转了一整圈。如此遥远的距离，蒙古人在这里集结重兵，到底如何才能打到杭州？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作为打击杭州的跳板呢？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当时蒙古人已经占领了现在山东、河南、江苏的许多土地，从这些地方出发，距离杭州最近的不过只有三四百公里，也没有太大的高山阻隔，为什么蒙古人不直接从更近的地方发起攻击，反而要找数千里之外、隔着重重高大山脉的西部小山沟作为出发点呢？

解读这次战争的过程，我们能充分领略作为世界战争大师的蒙古人的谋略。

---

① 《元史·世祖本纪一》。

② 元世祖平云南碑：“秋九月出师，冬十二月济河，明年春历盐、夏，夏四月出萧关、驻六盘，八月绝洮，逾吐蕃，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

最顽强的对手

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与南宋联合将金国灭亡。但也从这时开始，失去了屏障的南宋直接与蒙古人对垒了，双方之间发生了连绵不绝的战争。

最先进攻的是南宋，南宋的目的是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三大京城："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借助收复三京，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民族赶到黄河以北。至于号称"北京"的大名（现河北大名），由于已经过了黄河，是无法收复的。

但事与愿违的是，南宋收复三京之战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激发了蒙古人的好战性，于是战争就演变到了下一个阶段：蒙古人进攻，南宋防守。

不过战争也并非一面倒，蒙古人在进攻南宋时，发现原来南宋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它可能是蒙古人自从离开蒙古高原后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

在宋蒙对峙时期，双方的分界线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东面靠海的海州（现江苏连云港）出发，直到西面的岷州（现甘肃天水以南的西和县）。虽然南方与北方有着数千里的分界线，但实际上，由于山脉阻隔，沟通南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北方的军队如果想占领南方，要从这三条通道经过，才能顺利地到达南方的地界。

这三条通道的西道，是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翻越秦岭，到达南宋控制的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走古代的蜀道进入四川，这也是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主线路。如果能够控制四川，再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西晋灭吴之战的主线路之一。

西道是三条通道中绕得最远的一条，从位于杭州的南宋中央政府视角来看，这条路过于迂回，且必须通过两个最艰难的关口：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以及连

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蒙古人几乎不可能短期内打通这些关口。

从西道往东，就遇上了巍峨连绵的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天险，几乎是不可通过的，只有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还有一系列的小山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江苏、安徽、江西，将北方与南方隔开，也不容易通过。

但是，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在历史上称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从现在河南的方城县，经过河南的南阳市到达湖北的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湖北武汉（宋朝时叫鄂州）。

从荆州和武汉，可以过江去往湖南，也可以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人占领了中道北端的唐州（现河南唐河县及其周边区域）和邓州（现河南邓州市），也就是将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占领了，而宋朝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

从中道再往东，又是连绵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些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终于到达了位于现在江苏、安徽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

按常理讲，既然到达了平原地区，那么这里的道路系统就应该是四通八达，也是最容易进攻的。但不幸的是，淮河平原却是个例外。这里河湖纵横，充满了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擅长骑马，却对河湖地区不够适应，反而不容易发挥机动性。

在淮河平原上，人们经过数千年的交通实践，发现利用这里丰富的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所谓东道，就是在淮河平原上形成的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

最著名的通道是：从北宋曾经的首都开封出发，附近有数条淮河的支流，分别是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以及西面的颍水，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

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

在长江北岸（以及西岸），又有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扬州（位于现江苏省）与和州（现马鞍山市和县）。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现江苏镇江），当年南宋高宗逃避金军追杀，就是从这里渡江。而在和州的对岸也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马鞍山市），这里拥有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在这三条道中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中，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来进攻。

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进攻大师的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于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先获得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西亚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敌人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当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

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但这一次，蒙古人却遭遇了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隔了两三天的行程，通过快马传递消息，就可以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但是，中国南北三条道路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无法取得联系，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

在西道，如果要从西安进攻四川，首先要拿下的是汉中地区。汉中是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入蜀道路的中点，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根据地就在这里。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人顺利地攻克了汉中，获得了进入四川的跳板。

此后，蒙古人数次进入四川盆地，甚至攻陷了成都，但他们接下来碰到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试图从成都平原沿长江三峡进入湖北的宜昌、荆州地区，一旦过了三峡，也就可以乘胜攻克湖南、湖北。但南宋守将孟珙却在三峡部位扎住了口子。蒙古人经过数次尝试，不仅无法突破三峡，甚至连四川都守不住。他们每次攻克城池，劫掠完毕后，都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问题，无法久守，最终还是得撤出四川盆地。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也找到了正确抗击蒙古人的做法。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分布着许多小山，他在各地的山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进行死守，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

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了襄阳，但随后，南宋在中道的守将孟珙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变成了持久战。

而在东道，蒙古人的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之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

传统的三条线路都无法获得突破，在全世界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了僵持的滋味。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了汉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将蒙古人耗在了中国广大的土地上。

如果要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机动起来，回归到蒙古人习惯的作战模式中。但是，他们到底如何才能重新机动，打破僵局呢？

这时，蒙古人想到了一位汉人将领曾经提出的极其大胆的主张，正是他的奇谋让一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了史册……

蒙古人的第二战场

当我身临其境地站在滔滔金沙江边时，心中想的却是一位叫作郭宝玉的元代将领。

郭宝玉，字玉臣，自称唐代著名将领郭子仪的后代。他曾经在金朝为官，后投降了蒙古。当时，蒙古人还没有灭金，成吉思汗向他询问如何才能夺取中原，